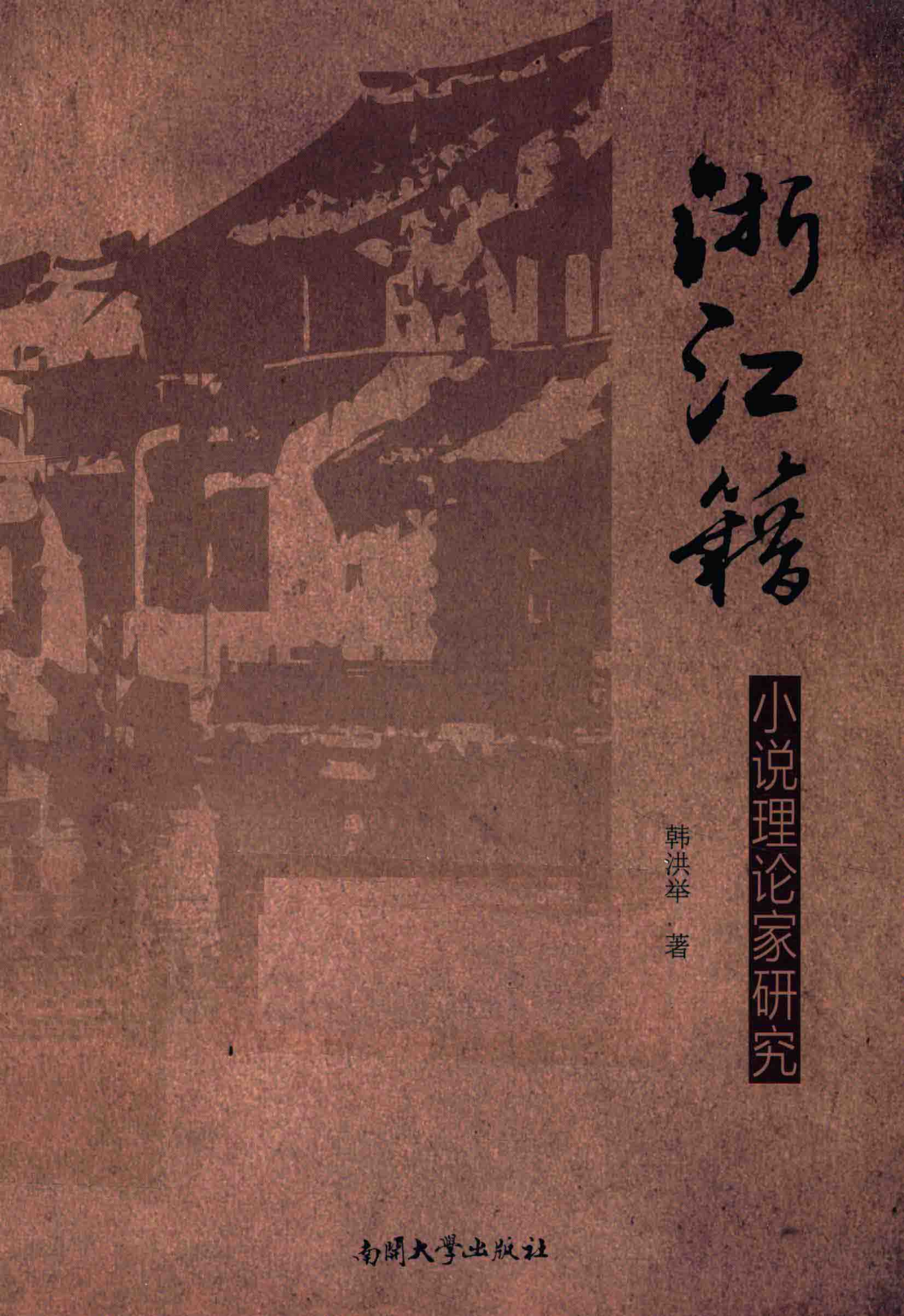




浙江籍

小说理论家研究

韩洪举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浙江籍小说理论家研究

韩洪举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籍小说理论家研究 / 韩洪举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310-05018-5

I. ①浙… II. ①韩… III. ①小说家—人物研究—浙江省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9019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322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六朝至唐的小说理论家	26
第一节 干宝：中国小说理论的发轫者	26
第二节 沈既济：唐传奇理论家	35
第二章 元明时代的小说理论家	47
第一节 杨维桢：元代小说理论的杰出代表	49
第二节 瞿佑：明代文言小说理论家	54
第三节 胡应麟：明代小说理论的集大成者	60
第四节 凌濛初：明代通俗小说理论家	73
第五节 蒋大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理论家	82
第六节 其他浙江小说理论家	87
第三章 清代小说理论家	95
第一节 袁枚：清代文言小说理论家	97
第二节 李渔：清代通俗小说理论家	101
第三节 汪象旭、陈士斌：《西游记》评点家	116
第四节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家	125
第五节 陈其泰：《红楼梦》评点家	150
第六节 其他小说评点家	167
第四章 近代小说理论家	181
第一节 姚燮：《红楼梦》评点家	183
第二节 俞樾：序文形式的小说批评家	193
第三节 钟骏文：善于借鉴西方小说理论的小说家	207
第四节 王国维：近代小说理论体系的建构者	212
第五节 夏曾佑：近代小说理论的演进者	223

第六节	章太炎：近代革命家兼小说家·····	231
第七节	蔡元培：《红楼梦》索隐派的开创者·····	234
第五章	现代小说理论家·····	245
第一节	鲁迅：现代小说理论的开拓者·····	247
第二节	茅盾：现代小说理论的杰出代表·····	261
第三节	周作人：新文学理论的开拓者·····	287
第四节	郁达夫：善于借鉴西方理论的小说家·····	295
第五节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权威·····	301
第六节	现代文学批评·····	322
参考文献	·····	345
后 记	·····	354

导 论

众所周知，浙江籍小说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众多，几乎占据了
中国小说的“半壁江山”，他们创作的小说数量是惊人的，其内容是异
常丰富的。^[1]同样，他们在小说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涌现
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浙籍小说理论家，他们留下的理论遗产弥足珍贵，
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浙江的小说文化如此之辉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我们研
究其独特的小说文化内涵与特点，有必要了解一下浙江小说文化的起
源与发展流变。

一、古老的浙江文化

一般学者都认为，黄河领域的中原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是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样的看法固然不错。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
发现，长江领域的浙江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也同样存在着灿烂的原
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南宋以来，
浙江文化包括浙江小说、浙江小说理论，其发展异常迅速，一直领时
代潮流之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知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浙江的地域自古以来就不算辽阔，
但这里却是一块风水宝地。她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素以“文物之邦”
“文化摇篮”饮誉世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浙江文化源远流长，据媒体最近报道，杭州萧山湘湖村下村遗址
和跨湖桥遗址的挖掘，表明“跨湖桥文化”至今已有八千余年的历史
了。^[2]另外，标志着长江流域已进入原始农业繁荣期的“河姆渡文化”，
至今也有七千余年。河姆渡文化以其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达到
的发展高度，标志着我们的祖先已经从采食经济开始向产食经济过渡。

我们说，能够自己生产粮食，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稍晚一些时候出现的“良渚文化”，至今也有四千余年的历史，这是长江流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学者们一致认定，良渚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华文明和国家从萌生到崛起的伟大历史时代。“良渚文化”遗址的中心，位于杭州余杭区的大观山。经考古学家推断，大观山遗址就是良渚文化时代的新兴城市，而且当时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规模已非常可观，这说明当时的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尤其是通过出土的玉器等文物以及大观山遗址宫殿基址的宏伟规模来判断，当时的社会礼制已相当成熟，这表明在当时的太湖流域确实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的雏形，我们一般称之为“良渚古国”。

遗憾的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长江流域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连续发生了洪涝、干旱、严寒、地震等自然灾害，整个南方地区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导致了良渚古国的突然消失，良渚文化也就此中断。随着良渚文化的消亡，南方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北方处于辉煌的青铜时代，逐渐向封建化社会过渡；处于南方的浙江文化则变成了空白，又退回到了极端落后的远古时代。

但是，浙江文化的落后是暂时的，东周时浙江文明又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春秋时期，于越族崛起于浙东，建立了浙江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这就是后来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越国灭吴而称霸中国，标志着浙江文明又重新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文明，继续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越绝书》记载勾践时，“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3]越国在当时的强盛由此足见一斑。所以我们说，越国文明虽然没有中原夏商周文明底蕴深厚，但她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浙江文明在春秋时代重新走到了中国的前列。

秦汉三国时期，浙江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汉末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军阀混战，给中原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至于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4]的悲惨情景。但是，远离统治

中心的浙江地区，相对来说没有遭到太大的战乱与破坏。东汉末年，孙坚、孙策父子很快就完成了江浙地区的局部统一，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破坏性相对较小。在孙氏集团的大力开发下，浙江的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加之避乱于江东的外来民众的积极参与，浙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异常迅速的。

这时期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东汉赵晔所创作的著名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它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小说作品，这是浙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巨大贡献，标志着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

此后，经过短暂的西晋，浙江进入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朝代更迭比较频繁，但大的战事主要发生在北方，南方的朝代更替多是通过内部的演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经济破坏不很严重。经过一二百年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浙江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我们说，六朝时期文化的主旋律虽然是“清谈”和“玄学”，但文学艺术也不容忽视，如王羲之父子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沈约的诗歌理论及小说《俗说》、干宝的《搜神记》及《序》、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志怪小说与理论主张等，其成就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干宝的《搜神记·序》还是我国较早的一篇小说评论文章，在浙江乃至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隋唐五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浙江经济也继续保持着上升的势头。文化艺术方面，浙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唐传奇等小说作品，有不少都出自浙籍作家之手，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唐代诗人沈亚之的《湘中怨解》《秦梦记》，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都是唐五代有代表性的作品。由于唐代的“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对北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南方则相对比较安定，社会发展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因而，浙江成了全国经济的中心之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已初露端倪。

宋元尤其是南宋，是浙江经济文化发展的大飞跃时期。宋室南迁建都杭州，给浙江经济和文化的带来了机遇，从根本上超过了中原地区。当时的杭州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繁荣景象为当时世界各国所罕有，以至于对明清时期

浙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真可谓“国家不幸浙江幸”啊！但随着南宋的灭亡，杭州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浙江在全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一下子走出了它的鼎盛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的落后并没有影响到浙江文化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元末，浙江文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杂剧活动由大都移到了杭州，出现了郑光祖、乔吉和秦简夫等戏剧大家，杨维桢的诗歌创作与小说理论，尤其是罗贯中、施耐庵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问世，标志着浙江小说进入到一个高峰时期，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世界小说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浙江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呈现强劲势头。特别是明初，由于南京被定为首都，明太祖和建文帝都比较注重沿海商业的发展，所以，浙江的商业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浙江最悲惨的历史阶段当推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比较顺利地被满清攻占，江浙地区成为抗清的最后阵地，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因而浙江遭到满清军队兵火的“洗礼”，许多地方被“屠城”，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浙江凭借数千年的积累，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形成的雄厚根底，浙江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直到今天一直处于全国领先的位置。明清时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及小说理论，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瞿佑、凌濛初、李渔、袁枚、陈忱、俞万春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小说家多不胜数，胡应麟、蒋大器、张竹坡、陈其泰等小说理论家也迅速崛起，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几千年来，勤劳而智慧的浙江人为开发和建设东南沿海的经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使浙江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优越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灿烂的浙江文化。在这丰富而灿烂的文化中，小说与小说理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是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国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

浙江小说理论家的成就是辉煌的，对于如此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自然不能熟视无睹，应该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其实，在现代化建设中，小说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是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开发和利用浙江的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资源，弘扬浙江小说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吸取其中的积极因素，以增强浙江文化的凝聚力与辐射力，增强文化对经济建设的推动力。

二、浙江籍小说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浙江籍小说理论家在小说理论方面卓有建树，其中不少人成为当时小说理论方面的权威人物，如干宝、胡应麟、张竹坡、李渔、王国维、鲁迅、茅盾、俞平伯等，他们的文学活动都是有全国意义、全国影响的。同时，他们的理论建树又与浙江血肉相连，体现了浙江地域文化的个性与特点。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各地域相依共存的国家，各民族、地域文化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而又互相吸纳和融合，最终形成凝聚力、生命力极强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从小说理论的发展演变来看，不同地区的文化确有不同的特色，这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小说文化多姿多彩。没有地方特色，也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区小说文化的特点，也就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小说传统与小说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浙江小说理论家的贡献从一个领域代表了浙江文化的重大成就，是展示浙江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浙江籍小说理论家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浙江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小说理论家，而且人才辈出，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性的小说理论家活跃于文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小说理论遗产，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从晋代干宝的小说理论问世以来，直至现代，浙籍小说理论家连绵不断，其中具有突出贡献、在浙江小说理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有干宝、沈既济、瞿佑、凌濛初、胡应麟、李渔、张竹坡、陈其泰、俞樾、姚燮、蔡元培、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夏曾佑、俞平伯、郑振铎、赵景深，等等。

第二，浙江出现了一批“专职”小说理论家，写出了中国一流的理论专论。他们的文学活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小说理论前进的步伐，为

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明代小说理论大家胡应麟，他的《少室山房笔丛》可谓明前中国小说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清代出现的《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红楼梦》著名评点家陈其泰，晚清出现的红学家姚燮、小说理论家夏曾佑和著名学者、小说理论大家王国维，尤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成为中国第一篇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名著的专论，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建造了又一块里程碑。

第三，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奇迹”，令学者们感叹不已，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奇观。

1. 浙江的地域自古以来就不是太辽阔，可以说是中国最狭小的省份之一，但浙江的小说理论起步非常早，一直处于中国小说理论的领先地位。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序》是中国较早的可以称得上小说理论的文字，干宝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先驱。

2. 清代的小说名著评点非常盛行，这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小说批评方式，但浙江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就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名著评点家，这也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仅清代就出现了《西游记》评点家汪象旭、陈士斌，《金瓶梅》评点大家张竹坡，《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姚燮，《聊斋志异》评点家方舒岩，《儒林外史》评点家平步青，等等。

3. 浙江近代的小说创作成就并不大，但仅在短短的近代时期，浙江就出现了俞樾、平步青、姚燮、夏曾佑、王国维、钟骏文、章太炎、蔡元培等如此之多的小说理论家，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近代著名小说理论家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浙江籍的，这在中国小说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

4. 浙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红学家，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我们知道，《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一部古典名著，它自清乾隆中期问世以来，研究者不绝如缕，于是就出现了“红学”和大批的“红学家”。在众多红学家中，浙籍学者占有很高的比重，而且不少都是红学权威，如陈其泰、姚燮、蔡元培、王国维、俞樾、俞平伯，等等。蔡元培的旧红学索隐派研究方法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他的《石头记索隐》在红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历史与时

代的产物；鲁迅、茅盾虽然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观点在红学界影响极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三、早期的小说观念与理论萌芽

众所周知，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历史传记和寓言故事，发轫于唐朝以前。而较之小说创作，小说理论自然要晚一些。但浙江小说理论家相对而言还是起步比较早的，晋代就出现了干宝，他的一篇序言，成了中国最早的小说理论文章。先秦至唐的小说理论可以说是浙江小说史上的发轫阶段，这时期的小说概念虽然已在典籍中出现，但还处于模糊阶段，当时人们对小说的概念也仅仅是初步的粗浅认识。

小说，可以说是文学题材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它的概念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一般来说，小说是指一种有人物、有相对完整故事情节的叙事文学形式。《辞海》对“小说”是这样下定义的：

文学的一大类别，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之一。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生活。但小说不同于其它叙事性作品，它可以运用各种描写、叙述方式和各种表现手法（如叙述事件的前因后果，描绘自然景物、社会环境、生活场景以及人物外貌、心理、言谈、举动和各种纠葛、关系等等），来生动地表现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5]

可是，这种小说概念并非自古就有。小说的概念从古至今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的“小说”二字，实际上与今天所说的“小说”关系并不大，其内涵和上述定义自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小说”一词最早并不见载于浙江的历史典籍，而是出现在《庄子》一书中。究其原因，大概人们会联想到早期的文化中心在中国北方而不是在南方的浙江。但《庄子》所说的“小说”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并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小说”一词最早不见于浙江典籍，就认为浙江小说的起源要比北方更迟一些。

关于中国最早的“小说”一词，《庄子·外物》中写道：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鰲扬而奋鬣，白若波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厭若鱼者。已而后世轮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渚，守鮓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6]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谈到“小说”这一概念时，一般总是引用这段话中的一句，即“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或者干脆几个字“饰小说以干县令”，如此断章取义，令读者感到摸不着头脑。我们知道，《庄子》一书中充满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上引“外物”篇的这段文字，实际上就带有明显的寓言故事性质。它的本意大概是：如果想通达大道，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有相应的途径和手段。就像钓鱼一样，任公子之所以获得惊人的大鱼，是因为他既有特别长大的渔具和饵料，又能够到大海深处垂钓，还要十分耐心地守候，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那些手持小钓竿，守候在河沟旁，钓条小鱼就能满足者，是不可能钓到大鱼的。于是，庄子得出结论说，欲靠“小说”是无法实现“大达”之理想的。很显然，庄子这里说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论、不值一提的小道理，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小说”，其含义是大相径庭的。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学者都认为，庄子所说的“小说”与《论语》中孔子门徒子夏所说的“小道”相仿，也是指琐屑的言论、不值一提的小道理，其实未必。《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我们认为，子夏这里所说的“小道”，当指农圃、医卜之类的道理，是与所谓君子之治世之道相对而言的。孔子及其门徒把治国济世看作“大道”，其他统统视为“小道”。此“小道”与小说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小说本不属于技艺百家中的具

体一家，古人不可能只把“小说”当作“小道”，其实把“小道”看作“小说”完全是后人的猜度与引申而已。

《荀子·正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者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

荀子所说的“小家珍说”与子夏所说的“小道”一样，与今天所认识的小说概念没有任何关系。荀子主要论述“正名”之题，在上述引文之前，他还列举了宋钘“见侮不辱”“情欲善”之说，墨家的“杀盗非杀人”之说，惠施的“山辨”之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说等，认为以上这些歪门邪说与正道相悖，是乱名的。随后，他在文中阐述了“道”的美好及其重要性，指出百家邪说即“小家珍说”与正道相悖，必然衰败。可见，荀子的“小家珍说”也与小说的概念没有多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中都谈到了“小说”的意思，却没有一人像庄子那样使用“小说”这个词语。这说明，在先秦时代还没有“小说”这个固定词汇，《庄子》使用该词纯属偶然。也就是说，同样的意思，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字眼而已。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了。

东汉初年，著名学者桓谭说过这么一句话：“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7]这里出现了“小说家”一词，可见诸家著述之外，已有自己独特的文章，被归为小说一家了。桓谭评论这种“小说”所说的“丛残小语”，意思是多为零碎的言论；所谓“近取譬论”，意思是以故事、寓言或传说作比喻；“短

书”指多用短篇记述。这就涉及了小说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与今天所说的小说概念已经有些相似之处了。这标志着东汉时期人们对小说观念认识的巨大进步。

比桓谭稍晚一些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他所作的《汉书·艺文志》中首次对小说进行了界定，并把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一：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8]

班固论述了小说家的创作过程，认为当时还没有文字，“道听途说者”的作品最初只能属“街谈巷语”，属于传闻的性质，既不一定属“刍蕘狂夫”之类，具备完全真实的性质，又很难否定事实的存在。传闻经过“闾里小知者”之手，“使缀而不忘”，然后由“稗官”予以加工润色，或由“稗官”收集起来。应当说，这是小说萌芽时期的创作情况。

接着，班固还列出了《伊尹说》《青史子》《师旷》《黄帝说》等十五家小说。其实，班固所列出的这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所谓的“小说”，均非出自先秦时期。因为这些被归入小说类的所谓先秦著作，其实绝大多数都并非出自先秦人之手，而是如许多论者反复证明了的那样，它们乃是后人辑录而成，或者根本就是后人的伪托。班固虽然列出这些属于先秦“小说”，但他本人多在所列作品后面注明“后人伪托”的话，如《伊尹说》后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师旷》后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黄帝说》后注曰“迂诞依托”，等等，这说明班固本人也持怀疑态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9]说明只有到了汉代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小说”，因为“小说”的概念只是到了汉代才有。至于班固为小说范畴划得如此宽泛，十五家中包含了琐事、遗事、历史故事、异术的记载等，这就论证了小说具有内容繁杂的特点。最为重要的是，他把小说和历史著作合在

一起，使小说作为一家，正式出现在历史文献记载当中，这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稍晚于《汉书》的张衡《西京赋》也提到过小说。文中写道：“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这里称小说为“秘书”，并且具体指出了其中的一种，还说它有“九百”（篇）之多。我们知道，在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十五家小说中，正有一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可证张衡之说不错。

另外我们还知道，在班固作《汉书》之前，已有刘向在汉成帝（前32—前7年在位）即位后，奉命校书近二十年，还撰有《别录》一书。后来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撰成著名的《七略》。班固参考了这本书，他正是在对《七略》“删其要”之后才写成了《汉书·艺文志》。因此，学术界一般认为，《汉书·艺文志》基本上延续了刘向父子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刘氏父子笔下大约已有“小说”这个词语了。

可见，在汉代，“小说”已经不再是偶尔出现的字眼，也不是像庄子那样偶然的组合。从桓谭、班固、张衡等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小说已经成为具有某种相对稳定意义的词汇了。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国的小说作品最早也只能出现在东汉时期，浙江人赵晔所著《吴越春秋》，当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之一。在此之前还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小说”作品。

“小说”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化，直到近代才基本定型的。唐代魏征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把小说归为子部。此后，刘知几作《史通》、宋代欧阳修撰写《唐书·艺文志》、明代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直至清代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是把小说归为经史子集中的史部，就是归为子部，无论史部还是子部，均不收录通俗小说。由此可见，中国“小说”一词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概念。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孕育、演化的，而

且总是先有某一事物的产生，然后才有人们对它的认识。浙江小说作品很早就出现了，但小说概念、小说理论出现得比较晚，这也就不难解释了。

我们探讨古代的小说观念，寻找古代小说理论的源头，这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我们无法知道汉代以前小说创作的详细情况，那个时期究竟有没有小说作品，但我们可以根据东汉的《吴越春秋》及晋代的《搜神记》等小说为我们提供的线索，了解到古代的小说家往往都是史学家，史学与小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早期小说的萌芽、形成、发展都与历史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在内容、结构、叙事方式乃至修辞手法方面，也都对古代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史传文学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样式之一，在小说正式诞生前后，它对小说及小说观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早期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浙江小说理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时期出现了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一文学现象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古代小说的形成、发展均与史传文学是有关系的。如前文所述，史学家对小说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魏晋小说家大多以史学家的著作（主要是史传文学）为典范，叙事方法和体例方面刻意仿效，内容方面则多采取史学家遗漏或弃而不用的史料，因此，早期小说又有“杂史”“野史”的称谓。可见，早期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即含有这方面的意思。

魏晋时代的小说大多如此，其例证比比皆是。我们不妨以人们所熟知的晋代王嘉著、萧绮修订的十卷本志怪小说集《拾遗记》为例，来了解一下该书的体例。《拾遗记》前九卷所记载的历代故事为：卷一，自春皇庖牺至尧舜八代；卷二卷三，记载夏商周三代之事；卷四，自燕昭王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卷五卷六，记两汉事；卷七卷八，载三国